

88第2期

(总018期)



阳江文史



政协广东省阳江县委员会编

1988年6月

目 录

阳江俚族、瑶族的活动概况与汉化(上)·····	曾传荣
郑家康烈士遗书三则·····	石英
我参加广州起义的前前后后·····	冯君銳
夜袭大沟乡公所始末·····	史汀文
解放后十七年	
阳江县普通中学教育发展概况·····	施宝楨
阳江县商会源起及其组织和主要活动·····	谢彦伦
从镬厂到玻璃钢厂	
——阳江县永丰镬厂发展史·····	阮凤权
端午阳江城漠江龙舟竞渡琐记·····	谢彦伦
民国时期阳江的一次贼劫史实·····	谭随时
二十年代初期的尖山渡·····	陈子平
文物三则·····	林尚知
阳江方言探源(十三)·····	许培栋

阳江俚族、瑶族的活动概况与汉化（上）

曾传荣

两阳在秦时属南海郡（注），两汉时属合浦郡。当时居住在越南及以南沿海的民族，称为越族；由于种族众多，互不统属，又泛称百越；其中居住在两广的称为南越（又作南粤）族，亦称南蛮、蛮夷。而住在广州以南，两阳、茂名、湛江的土著民族，在东汉以后至隋、唐的南越族中，以俚族、僚族最显著。《晋书》把古越族的后裔分为俚、蛮、僚三种。南朝、隋、唐时，俚、僚族除他迁外，多渐与汉族融合，同为齐民。《隋书》：“古先所谓百越……皆列为郡县，同之齐民，不复详载”。明代忽多瑶族活动的记载，清乾隆以后又逐渐融合，已和汉人融合为一体了。目前唯阳春永宁区横洞乡及圭岗区的山塘、上洞等

地有瑶族聚居。1981年，省民委正式承认阳春该地赵姓为瑶族后，1983年正式批准永宁建立“横洞瑶族乡”。据八二年统计该乡共一百二十三户，人口八百九十人。

注：《通典》、《广东通志》、《阳江县志》记：阳江，秦属南海郡，谭其骧的《中华历史地图集》属桂林郡。

一、阳江古时为俚族聚居的地方

最早记载俚族活动的是范曄的《后汉书·南蛮传》，它说：“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九真徼外蛮里张游，率种人务化内附，封为归里君”。里又作俚，张华《博物志》说：“交州人名俚子”。唐章怀太子李贤注：“里、蛮之称号，今呼为俚人”。阳江当时属交州合浦郡。三国时，吴国万震的《南州异物志》载：“州之南，有贼曰俚。此贼在广州之南，苍梧（今广西梧州）、郁林（广西贵县）、合浦（广西合浦）、宁浦（广西横县）、高凉（今广东阳江）五郡中央，地方数千里。各有长帅，无君主，恃在山

險”(見《太平御覽》俚條)。又載：“烏浒……在廣州之南，交州之北”。《太平寰宇記》謂嶺南之橫州、柳州、貴州、容州、郁林州等皆烏浒人。陽江是古高涼縣的縣治所在，又是俚人聚居的區之一。

萬震所說俚族居住的區，僚族亦居其間，但多居于廣西接近粵西一帶。《三國志·張嶷傳注》謂：“牂牁、興古僚種復反，(馬)忠令(張)嶷領諸營往討…嶷招降得二千人”。興吉郡為鳩僚最多的地方，它東與郁林相接，而郁林則多烏浒。《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載：“靈帝建寧三年(公元170年)，郁林太守谷永以恩招降烏浒十餘萬人內附，並置七縣”。蒙文通《越史叢考》謂從習俗考之，及《北史·僚傳》、《隋書地理志》僚人喜用銅鼓，以烏浒人與僚人最近，烏浒是僚同類。同樣，俚人亦習用銅鼓(注)，亦有人以烏浒人是俚人中的一部份。這都未能從語言和多方面深入考究，尚難斷言。

注：晉裴淵《廣州記》載：“俚僚鑄銅鼓，鼓唯高大唯貴”。俚人鑄的銅鼓，鼓面有太陽紋，全鼓遍布圖案，以雲雷紋為主。鼓面邊緣有四或六只青蛙。蛙身亦飾花紋。據《陽江縣志》載，康熙時在銅鼓嶺掘得一銅鼓，道光年間板桂巷譚伯筠家掘出一銅鼓。解放前上洋姚姓保存一銅鼓，也都有雲雷紋和青蛙，却傳為馬援戰鼓，解放後，由縣委會通知收繳此鼓，曾存於七區區委會，後我調離縣委會，不知後來此鼓是否上繳給省博物館。田寮和譚家銅鼓，也不知去向。現附錄《陽江縣志》《漢銅鼓》一文如下：“，一在田寮村李家，面徑今工部尺二尺五寸餘，身高一尺四寸餘。面分五圈，作八角錢文，余四圈皆作雷紋。最外一层四旁有蛙為耳。身分三层，腰狹而腹隆，上下两层皆然，唯中层独锋起有棱。上层左右各有两耳，每层皆作横线紋。无款识，重约百二十斤。康熙時在附近銅鼓嶺掘得，相傳未發現時，每當陰雨輒聞濶濶有聲云。

一在邑紳譚伯筠家。開系道光年建宅時所得。鼓制平面平底細腰，面徑尺余，高約二尺，紋作雲雷旌旗形”。

1、俚、僚族的生活习尚

《南齐书广州郡上》载：“广州……滨际海隅，委输交部，虽民户不多，而俚僚猥杂，皆楼居山险，不肯宾服。”

《隋书·地理志下》载：“自岭以南二十余郡……其人性并轻悍，易兴逆节，椎结箕踞，乃其旧风。其俚人则质直尚信，诸蛮则勇敢自立，皆重贿轻死，唯富为雄。巢居崖处，尽力农事。刻木以为符契，言誓则至死不改。父子别业，父贫，乃有质身于子。诸僚皆然。并铸铜为大鼓……俗好相杀，多构仇怨，欲相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本之旧事，尉陀于汉，自称蛮夷大酋长、老夫臣；故俚人称呼其所尊为‘倒老’也，言讹，故又称‘都老’云”。

《隋书·南蛮传》：“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蜒、曰僮、曰俚、曰僚、曰徭、具（与俱通）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其俗断发文身，好相攻讨，浸以微弱，稍属于中国，皆列为郡县，同于齐民”。

上引史书所述，俚蛮僚都有共同的地方，亦各有其特点，但笼统概述，简而不明，现已难悉其详了。

由于南越族一般处于奴隶制社会，文化较落后，生产方式不同，风俗习尚各异，好互相攻击，不肯宾服，所以汉族统治者常欲羁縻之而使就范，不服则用武力镇压，所以在岭南一些重要州郡，常驻重兵。据《旧唐书》载：岭南五府经略使，绥靖夷僚，统经略、清海二军，……桂管、容管、安南、邕管四经略使。五府经略使治在广州，管兵万五千四百人；经略军在广州城内，管兵五千四百人；清海军恩州城内，管兵二千人（按《旧唐书·地理》载：“恩州……内有清海军，管戍兵三千人也”。从总数核对，应是三千人。）；桂管经略使治桂州，管兵千人；容管经略使，治容州，管

兵千一百人；安南经略使，治安南都护府，即交州，管兵四千二百人；邕管经略使，治邕州，管兵七百人”。这些地区都是俚僚杂处地区。恩州驻兵三千，可见恩州是要冲重镇，俚族融合较早而多，地方安完，有利于威镇附近不臣的部族。

2、古高凉地区的经济活动

《梁书·王僧儒传》：“梁天监初（公元502年）……南海郡常有高凉‘生口’及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旧时州郡以半价就市，又买而即卖，历政以为常”。俚人部落豪酋“鬻口为货，掠人为奴婢”（《新唐书·孔戣传》）。他们不仅因“生口”（俘虏奴隶）、翡翠、明珠、犀象之饶，雄于乡曲（《隋书·货志》），而且还把“生口”作为重要货物卖到各地和海外去。这些“生口”，因为来自高凉，所以还特别被标明是“高凉生口”。可见当年高凉地区互相攻击略夺之烈，不但掠夺翡翠、明珠等贵重器物 and 犀象等名兽，还掠夺俘虏作为会说话的生口卖作奴隶。阳江一带当年的情况可以概见。

3、从高凉地区州郡省设置的演变，以观察俚族与汉族的融合

汉武帝平定南越，置合浦郡，所领合浦、徐闻、高凉、临允、朱崖五县，都是俚族聚居的地区。虽然是各族杂处，但俚族最多。他们互相攻击，为了部落利益，俚族内部部落也必然攻击略夺。他们的卧榻之侧，当然也不会轻易接受朝廷的统治与官吏的苛政榨取。统治者每用镇压与安抚两种手段来求羁縻。在汉朝，统治者的权力，只能集中于郡县的治所，辽阔的区域，鞭长莫及，是地方民族首领的势力范围。汉献帝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孙权派步骧为交州刺史，要统兵二万人南下。可见当年郡、县的统

治还要依靠带来的兵力。当时的交州刺史治广信，即今广西苍梧县。这两万人到了苍梧郡的高要峡口，即受到苍梧人衡毅和钱博的袭击。衡毅战死，钱博失败，与其徒属逃到高凉（今阳江），继续反抗。这个钱博是苍梧郡的地方实力派，也可能是俚族首领之一。他在高凉盘踞了八年，交州刺史亦莫奈之何。及吕岱为交州刺史，再施压力，钱博才乞降，但仍须任他为高凉西部都尉，成了吴国的正式地方官员。次年，魏黄初元年，吴因势乘便，高凉县分置高凉郡。高凉郡虽仅是高凉县的一小部份，但吴国的有效统治权力和地方则稍扩大了。这时，除在原高凉县治置高凉县外（今阳江县北部地区），还增加了安宁县（今阳江城及县东境地）和西平县（今白沙、平岗、埠场接近程村）。此外，原高凉县其他地区，还是俚族首领的势力范围。

过了十八年，由于高凉郡巩固了，才在郡的东北、北、西北原属高凉古县的地区置高兴郡。领五县，除莫阳以漠阳江命名外，其他如广化、海宁、化平等县，从其命名就可看到是新从此方少数民族手中取得的，是一种羁縻性的名称。《隋书·货食志》载：“岭外酋帅，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饶，雄于乡曲者，朝庭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历宋、齐、梁、陈、皆因而不改”。这就明确说出朝庭用怀柔政策，将酋帅所统治的地区，置为郡县，而封酋帅为这些郡、县官，朝庭、酋帅都收其利。这是六朝时对边区民族杂居的地方所采取的措施。所以郡县小而多，并时常改变，以适应朝庭权力薄弱而地方民族复杂和好攻略的情况。高兴郡并入高凉郡后，宋时，高凉郡领七县，化平没有了，而增加平定、西巩、禽乡等（县）。宋元嘉九年，在高凉郡的西南（亦今阳江县境的西南）置宋康郡，领九县，除将原高兴郡治广化作为郡治及因地命名的（丹）城、石门、海邻（陵）等令外，如化隆、开宁、绥定、覃、遂度（《宋书》作逐度，《齐书》作遂度，并增舆定令）令，也标示这些县是用威力或怀柔手段从酋帅手中取来的。刘宋

宋康郡，南齐改海安为齐安，建齐安郡，无非表示宋、齐用怀柔政策取得安乐的愿望。但是，各豪酋也不愿他人多染指，不愿受控制和榨取，不甘羁縻，有的退居深山高洞，有的隐报户口，以减少和逃避赋贡。如晋时高凉郡户二千，高兴郡户一千二百；刘宋时，高兴郡已并入高凉，除高兴郡广化改作宋康郡治外，高凉郡领七县，才有户一千四百二十九，口八千一百二十二。宋康郡领九县，也只有户一千五百十三，口九千一百三十一。建置郡县后，户口反而减少，正说明聚居的俚族叛逃、摆脱羁縻和瞒报户口的严重情况。那些未置郡县的空白地区或郡统治力薄弱的地区，便会常发生对抗和互相攻击掠夺的战乱。如吴时发生“高凉贼率仍弩等破略百姓，残害吏民”（见《吴书·钟离牧传》注），薛综上书孙权说：“尚有高凉宿贼……依作强盗，专为亡叛遁逃之藪”。及梁讨平俚洞，乘势于较稳定的高凉郡置高州，同时增置杜陵（阳江西部）、阳春、连江、电白等郡，可是许多郡的权力仍很薄弱，变动频烦，无户口记载。直至隋大业初废高州，复置高凉郡，领高凉、杜陵、海安、阳春、连江、电白、石龙、茂名、吴川等九县，才有户九千九百十七。而在梁大通中（527—528年）置高州时，或在冼夫人实力雄厚时，高凉冼夫人（越族俚人）的家族控制的部落，跨据山洞，有十余万家。冼氏家族就是在高凉郡及附近各郡的广大山区。郡县力量单薄，所能控制的地方少，编户自然少。冼夫人之兄冼挺被派到高梁山一带管辖附近各部落，他却常恃强侵略邻近各州郡，掠夺“生口”财富，称南梁州刺史。这时冯融为罗州刺史，与冼挺为邻，号令不一。当年古高凉属地区情况，可以概见。

4、冼夫人促进国家统一与民族融合

冼夫人，高凉（今阳江）人，其家族历代为南越首领。冼夫人贤明，多谋略，婚前便善于抚循部众，能行军用师，压服反抗的族。常劝导亲族为善；并以大义和形势劝服其兄，不再侵略，使

“怨隙止息，海南、儋耳归附者千余洞”（《谯国夫人》）。而罗州“自是溪洞之间，乐樵苏而不罹锋镝者数十年”（《广东通志·冯融传》）。冼夫人一家，世为南越首领，势力强大，威望很高，其动向对南越举足轻重，影响深远，是统治者所深惧的。难得冼夫人幼贤明，有大志，目光远大，能破除部族偏见，与汉族高凉太守冯宝结婚，并顺应人民希望国家统一的历史潮流，一生维护国家统一，主张民族和睦团结。所以她结婚后，“约戒本宗，使从民礼”，带领部落学习汉文化，促进民族团结与融合。“每与宝参决辞讼，首领有犯法者，虽是亲族，无所舍纵。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违”（上所引均见《谯国夫人》）。这就促使消除了互相攻击与掠夺，逐步达到安定团结。因海南、儋耳有千余洞归附，到了梁大同年间，夫人请命于朝，置琼州（见道光二十一年《琼州府志》），进一步促进团结统一。罗州刺史冯融“三世为州牧，号令不行”，这时“俚人始相率受约束”，冯融每行步所至，蛮帅焚香具乐，望双旌而拜，迎者相望，辄戒其下曰：“冯都老来矣！无为不善，以婴罪戮”。（见《广东通志·冯融传》）这是民族融合的典型例证。

隋开皇十年冬（公元590年），番禺俚帅王仲宣反（注一），首领皆应之。冼夫人派孙冯盎与隋将共败仲宣。于是，夫人亲披甲，乘介马，领骠骑卫诏使巡抚诸州，使苍梧、冈州、梁化、藤州、罗州等部族首领都来参谒，仍明令他们归领其部族，岭南遂获平定。后番州（即广州）总管赵讷贪暴肆虐，诸俚僚多叛亡，夫人上书隋文帝，弹劾赵讷，使致于法。又奉诏招慰亡叛，历十余州，谕诸俚僚，所至皆降（以上所引均见《隋书谯国夫人》）。夫人所巡视的州，有的是羁縻州，有的已是朝廷的州刺史，但俚僚势力仍很强大。可见冼夫人威望很高，一生致力于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融合，效果是很显著的。

冼夫人死后，她的孙——高州刺史冯盎，继承她的遗志。仁寿初（约公元602年）潮、成等五州僚叛，他赴京清讨叛乱，旋即

奉诏讨平了。唐贞观初，罗、窦（今化州、信宜一带）诸洞僚叛，盎率众二万为先锋讨平。冯盎在隋为高州刺史，在唐武德、贞观间为高州总管，（当时高州治所在今阳江县城。）前后达四十余年，对促进国家统一与民族融合也是有功绩的。

冼夫人与冯宝结婚后，她的儿子冯仆亦与其母家冼氏结婚，这就促进了汉俚族的通婚，俚族首领及其子弟部族与汉族紧密交往多了，学习汉文化礼仪和汉语，出任官职，自然加速了融合。因此，冯盎死后，分高州置恩州，以抚其子，恩州户九千，高州户一万二千四百，春州户万一千二百十八。由于民族融合，编户人多，所以户数比隋时激增数倍。

唐朝中叶，卢钧出任岭南节度使时，已是“僚与华人错居，相婚嫁”了（《新唐书·卢钧传》）。高凉地区，“自隋唐以后，渐习华风，休明之化，沦洽于兹，椎变跣为衣冠，侏僂化为弦诵，才贤辈出，科甲蝉联、彬彬然埒于中土”了。（《古今图书集成·方与外编·职方典》第1357卷《高州府部汇考三》）没有提俚族，是俚族已与汉人融合了。（注二）

由于冼夫人是高凉人，而她的孙冯盎又在高州（今阳江）先后任职四十余年，所以阳江的俚族是融合最早最多最彻底的地区之一。后来建恩州时，恩州编户比春州和高州少二千余至三千余，也与此有关。冼夫人病死，隋文帝“赐夫人临进县（今海南临高县）汤沐邑一千五百户”。冯盎必然派不少亲信的与汉族融合的人前往卫护。冯盎于“隋亡，奔还岭表，啸署酋领，有众五万”。他当然是首先回到高州，这五万人当然是冼冯部族的子弟兵。他很快“克平二十州，地数千里”（《新唐书·冯盎传》），在征战过程中必有死亡、流失，为了巩固占领的州县也要分驻许多人员，恩州编户少是必然的。《广东通志》载：“熟黎其先本南恩（州）、藤（州）、高（州）、梧（州）、化（州）人……因从征至此”。亦足说明。

阳江早已没有俚族踪迹，但在汉人中就有俚族融合的成份。不

仅冯盎的族裔如此，我们在隋唐时居于阳江的汉族后裔都会是如此。据民族学者研究和古史书所述，俚族把水田称为“那”，所以密耕的村往往称为“那某”；俚族跨据山洞，据洞而居，所以有人亦以“某洞”为俚人曾聚居的地方。据《广东通志》、李调元《南越笔记》等书记载，“自阳春以下至琼，地名多曰‘那某’、曰‘罗某’。现在这里地区仍有不少保留这种名称。据《阳江县志》所载，在清朝时，称‘那某’的村有八十一，称‘某洞’的村有一百三十五。这算是俚族曾在阳江生息的一点迹象吧。群众聚居是迁徙不定的，当然不能说居住在‘那某’的村的人民一定是与俚族融合的汉人。我们汉族祖先，在我国东西南北居住的都曾和该地区的少数民族融合而形成现在的汉人，这是人类学、民族学者的通论。（附说明）

注一：《番禺县志·纪事》冬十月，番禺俚帅王仲宣反”。又见《羊城古钞·六朝杂纪》、《资治通鉴·文帝本纪》、《隋书·谯·国夫人》载番禺人王仲宣，没有说是俚人。

注二：史志最后提到粤西俚族的是后梁开平四年（公元910年），雷州俚人首领孟喜等造反，被梁朝派兵镇压，孟喜“率众远颺”。

附说明：俚这一种族称最早见于《后汉书·南蛮传》，而黎这一种族称最早见于唐人著作。唐刘恂的《岭表异录》载：“僮，振夷黎，海畔采（紫贝）以为货”自唐出现黎称以后，俚称逐渐消失，史志多称述黎。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叙述儋州风俗时说：“俗呼山岭为黎，人居其间，号曰生黎”。《广东通志·俚户（四库全书本）》载：“俚，蛮之别落也，后汉谓之俚人。俗呼山岭为黎，而居其间，于是讹俚为黎。而黎之称始此”，这说明是讹俚为黎。清顾炎武《郡国利病书·广东篇》还指出：“俗呼俚为黎，义取山岭”，“俚讹为黎，声之转也久矣”。照此说，唐以前的俚，即唐以后的黎。许多史书作者都主此说。我认为还需说明：后汉至隋时，广

州以南，交州以北两广这段地区，俚族很多，梁大同间，海南，儋耳有千余洞归附冼氏(俚族)部族，他们当是俚族。海南，儋耳这些俚族后因声转讹为黎是近理的。但不是各地所有的俚族转称为黎族，如后梁时孟喜等还称俚人，广西也有个别地区有少数俚人，他们保持俚族言语等不变，而绝大多数广西俚人与当地民族融合而发展成为壮族的一支了。粤西的俚人都与汉族融合成为汉人了，但也还有一些居民还说或会说黎话、海话，也可见俚族的历史长久与影响的深远。按黎族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

《明史》(卷319)：“熟黎之产，半为湖广福建奸民亡命，及南恩、藤、梧、高、化(州)之征夫利其土占居之，各称酋首”。《琼州府志》：熟黎旧传南恩、藤、梧、高、化(州)人，多王符二姓，言语皆六处乡音；因从征至者，利其山水田地，占食其间，开险阻，置村垌，以先入者为垌首，同入共力者为垌目。父死子继，夫亡妇主”。这亦说明南恩州、高州、化州等一些俚族后代随征至海南而成为熟黎的过程。

郑家康烈士遗书三则

石 英整理

郑家康同志是广东省阳江市阳江县程村镇石碑村人，1898年生于一个中农家庭，青年时代在阳江中学读书，勤奋好学，刻苦钻研，每每读书到三更半夜。后来，虽然家庭经济发生困难，仍坚持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这期间，他开始接触先进思想。毕业后，在朋友帮助下，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后转德国，继在苏联工作数年。1924年返国，在上海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四、五年，先后到过福建、山西、陕西等地工作。1931年在陕西被捕，解往南京。在狱中受尽了拷打等酷刑。反动派还怕他逃跑，把他两脚锯掉，后在狱中英勇牺牲。（注）

郑家康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曾通过第三者先后给女儿郑志坚同志寄回三封信。现将郑志坚同志口述三封信的内容刊出，以飨读者。

（一）

红的小孩，
是初升的太阳。
从黑暗的长夜，
开始走到光明的世界。
旧的境地现在崩坏了，
逼得要走到新的地方去。
我们在造桥，

很快会把你们——红的小孩，
引导过对岸的乐园里。
那边，
有小鸟唱歌，
只有红的小孩，
才能听得懂的。
那里，
还有很好的生活资源，
亦只有你——红的小孩，
才能享受到。
你现在努力读书吧！
识多几个字，
等到不久的将来，再来上海。

(二)

我离家已多年了，使你们整天望，只管望、难过，我也当然知道，不过实在没有办法。屋顶未曾盖好，下不得地来。我们现在正在做着一张大蚊帐，等这张大蚊帐做好之后，你们青年人再不要受蚊子咬了。这张蚊帐非常大，可以盖住二十多省人，所以要好久好久才能成功。我讲的话，你明白了吗？

(三)

子曰铺里边摆的书，如《先进》、《学而》等等，切不要读，至少读熟了也不明白，徒然费了时间。学校里国文教科书等，多读、多看、多写，读熟了将来便大有用处。

我现在写首打油诗你读。

一阵乌鸦噪晚风，
生徒叫得好喉咙。

“张蓝李白钱周郑”，
“天地玄黄宇宙洪”。
“天子重贤豪”念熟，
“人之初”又去无踪。
《大学》看来全不懂，
呱呱又读起《中庸》。
山梁雌“鸭”煲薯仔，
鲍鱼之肆买虾公。
狗无骑得骑猪易，
孔丘孔明算老宗。
馆仔先生穷过鬼，
十年窗下不通风。

注：摘自《广州市革命烈士传略·郑家康烈士传》

我参加广州起义的前前后后

冯君锐

编者按：冯君锐，原名宝铭、保铭。原阳江县江城镇人，一九〇八年出生。大革命时期参加共青团，二九二七年曾先后任中共阳江县和云浮县委委员。后因受立三路线迫害而离脱党。嗣后，在越南、香港等地从事教育工作，解放前夕，曾为保护广州交通物资工具作出了贡献。现是致公党广东省委顾问。本文是他参加广州起义的回忆。原载《广州党史资料》第三十三期，现由本刊转载，以飨读者。

参加广州起义，是我一生中偶然碰上的机会。六十年代后的今天，想起来也是一段光荣的历史，年已八十的我，感到值得自豪……我是幸存者之一，抚今追昔，我的年华并没有虚度……

一九二五年，在大革命的薰陶下，我追求进步，考入中山大学理科预科读书。中山大学是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理科不少同学是中共党员或团员。我和吴毅、陈铁儿（陈铁军的妹妹，原名燮元）等同班。那时，革命气氛十分浓烈，省港大罢工的示威游行，收回教育权的斗争，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宣传等等，我都积极参加了，不久，便加入了共青团。

当年，读大学要花很多钱，我不愿当伸手派，经同学介绍，我在知用中学任军事训练部主任、童子军训练主任和舍务主任，每月工资二十四元，勉强解决了半工半读的学习费用。我住在知用，活动在知用，团的关系也转到知用来了。

约在一九二七年三月初，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在东皋大道省农会给我们讲话，内容大意是：国民党右派分子正在加紧搞分裂活动，这些分裂已不是针对一个人或一件事，而是锋芒对着我们。因为反动集团已经篡夺了党政军大权，从各方面的情况表明，他们正在磨刀霍霍了。你们千万要提高革命警惕性，不能太天真地看问题了……这是他离开广东前的最后一次讲话，也是永别的留言。不久，他的话应验了。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继上海国民党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广州国民党反动当局也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他们包围了中山大学，逮捕和杀害了以毕磊为首的数十名中共党员和团员。在中山大学被开除通缉的四百多名革命师生、党团员中，我也榜上有名。

大革命时期，知用中学是一间比较进步的学校，教职员大部分是中山大学学生。进步的师生较多，当然也有右派混在其中，但毕竟进步的占多数。如薛耀英（即薛白）、丘祥霞（丘九）、何鸿坚（何华表），其弟何鸿柱是中大附中团支部书记（“四·一五”牺牲）、罗应嵘、任炜村（即任泊生）等，均在这里活动。我被通缉后，得到这些同学的掩护，隐蔽了几个月。

在那斗争尖锐复杂的年代，考验着每一个人。在中山大学、附中、附师和其他学校，一些经不起考验的贪生怕死鬼成了革命的叛徒，臭名昭著的有：孔圣裔、丁鸿训、丁鸿浩、冯全高和候交礼兄弟等，他们天天带着反动军警搜捕革命者，成千的烈士牺牲在他们手里。六月间，李济深发动第二次“清党”，我被叛徒举报，这个人原是大中附中学生周应湘，是后来我的连襟，因我的前妻麦道明（那时我们只是好朋友，还未发展到恋爱关系）和她的姐姐麦道华住在一起。一天，她从姐姐口中探知敌人要捉我的消息，便跑来通风报信说：“周应湘举报捉你，已将李济深的逮捕手令交给候交礼了，快走！”我便匆匆离开知用中学，避往亲戚家，到了香